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专家视点

主权觉醒搅动世界格局

□ 刘建飞

前段时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在打击毒品、菲美军演等问题上同美国产生摩擦，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也为研究者们提出了新课题。有人从中美博弈角度审视此事，也有人从政党政治角度看菲律宾对外政策变化，还有人从杜特尔特个人的视角来探究问题，因为杜特尔特与当下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极其相似。笔者以为，如果将杜特尔特同美国闹别扭与前不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未遂政变问题同美国政要吵架并亲近普京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一个趋势性的现象，就是美国的盟友们越来越寻求独立自主，越来越珍视主权。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作主权觉醒。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主权国家就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主体，在法理上，各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与之相应，各国都非常珍视主权，将之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然而，在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时代，小国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大国的尊重，迫使许多小国同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大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得到安全保障。而与大国结盟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的主权。至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广大殖民地，更是连主权都没有，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的主体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主权觉醒。促成这一变局的重要推手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将维护国家主权作为一项宗旨，使得那些加入联合国的小国的主权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小国被大国兼并、分割的事情大为减少。联合国的存在还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那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现在已经有193个，其中绝大多数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是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新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更为珍视主权。有的国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还有的国家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以促进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在冷战期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世界。

然而，由于冷战对抗以及强权政治横行等原因，有些中小国家还是走上了结盟的道路，希望通过结盟来获取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可以搭上大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使自己实现较快速的发展。历史现实也展示出了结盟的许多好处。就拿美国的盟友来说，一些国家确实通过牺牲局部的主权换来了安全保障和发展条件。对这些国家来说，主权觉醒还不够彻底，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一个“主人”。

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同大国结盟的弊端日益显现。大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越来越虚拟化，因为许多没有同大国结盟的小国，同样安然无恙。而大国却总是试图将盟友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棋子、“巧实力外交”的工具，挑动它们同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抗，而自己从中渔利。在这种国际政治游戏中，牺牲的是小国的发展利益和长远的安全利益。严酷的现实促使这些大国的盟友们进一步觉醒起来，更加珍视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一切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唯盟主的马首是瞻。近期菲律宾和土耳其所表现出来的“抗美”倾向，正是这种主权觉醒的体现。当然，直至目前，美菲、美土之间的争斗还属于“同盟内部矛盾”，无论土耳其还是菲律宾，仍然表示继续留在盟内。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主权觉醒严重冲击了大国战略格局，同时也是世界格局非极化的体现。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主权觉醒，以往的主角基本上是不结盟国家，像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种“盟内造反”只是个案，那么近期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些美国盟友的举动可算作主权觉醒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能否成为主权觉醒的新气候，一方面取决于美国怎样调整其结盟政策，另一方面更在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是否有利于主权觉醒。如何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得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能享受和平、安心发展，是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有责任为之付出努力的伟大事业。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的进展与影响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无疑对中国构成了印度洋海上通道的潜在安全风险和挑战，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西部陆上边界的安全压力。

□ 慕小明

日前，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即《后勤保障协定》），美印防务合作迅速升温。

美印缘何强化防务合作

正如美印两国防长在签署《后勤保障协定》新闻发布会上所言，美印强化防务合作，是美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印度洋地区战略布局，印借助美先进技术与资金提升实力与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美印战略合作关系提升。美印认定彼此为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拥有共同的多元文化、自由和法制等价值观。奥巴马和莫迪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积极推动防务贸易、区域安全、海上安全、反恐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呼吁在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等全球和区域性现实问题上开展积极合作。2016年6月莫迪访美，与奥巴马明确了美印关系的新定位，印度成为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两国将彼此视为“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首要伙伴”。

美印亚太战略实现对接。2014年莫迪提出“东向行动”政策后，2015年1月奥巴马即表示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提供了空前的机遇。随即双方发表《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表明印度接受了美国对其在“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角色定位。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印后表示，两国领导人赞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具有战略契合点，并会提供更多的合作机遇。

美印防务贸易政策契合。在防务贸易政策领域，美国主要对印度“国防补偿政策”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政策性问题不满。印度则抱怨美国复杂而多层次的军售监管和审查制度等问题。为此，2012年美国启动了为印度量身打造的“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2014年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决心清除国防工业等重要行业领域的贸易制度壁垒。2016年6月莫迪访美，奥巴马表示将支持“印度制造”计划，在“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下扩大合作制造和技术的共同研发。

近期美印防务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突出表现在：高层互动频繁、联合军演增多、军贸合作加深、共享基地与情报，朝着“全方位、多领域”方向发展。

高层互动频繁。2015年1月25日，奥巴马访印，两国发表“印美联合声明”和“亚太及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构想”。6月2日，美防长卡特首访印度，正式签署新版《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15个防务合作领域，包括简化美对印防务技术转让、加强军工生产合作等。9月23日，印总理莫迪访美，美印防务合作是其外交重点。2015年12月，印国防部长帕里卡尔首次访美。2016年4月，美国防部长卡特再次访问印。2016年6月，印总理莫迪再次访美，印美关系定位再升级。9月28日，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再次访美，两国防长签署《后勤保障协定》。次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印度，主持第二届美印战略经济对话。

联合军演深化。印度是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非盟国之一。近年两国联合军演规模不断扩大，科目逐步增多，朝着机制化、实质化、常态化方向发展。包括美印陆军“准备战争”年度联合军演、美印海军“马拉巴尔”年度联合军演、美印空军“对抗印度”和“红旗”年度联合军演、美印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拉吉·普拉哈尔”联合演习等。“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多边联合军演。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马拉巴尔2016”联合军演移师西太平洋和日本的加入耐人寻味。9月，美印陆军在印度北部山举行联合演习，内容包括从维和行动到多兵种作战和战术训练在内的多项任务。

军贸合作强化。2011至2015年印度武器进口额占全球的14%，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庞大的军贸市场成为美印防务合作的助推器。2008年以来，印度从美国采购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随着美国逐渐放宽对印技术限制，印度开始致力于与美国联合研发和生产武器装备。2015年6月美印国防部长签署新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将目前两国防务合作中的“买卖关系”发展为“联合研制关系”。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等美国军工企业均加强了在印度防务研发和制造领域的参与力度。

共享基地与情报。美军在印度洋仅有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为此美国一直在谋求能够使用印度的基地、港口及军事训练场所，使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部署连为一体。美印《后勤保障协定》的签署，将允许两军互用陆海空基地，进行后勤补给、维修和休整，以“记账”的方式获取对方除进攻性武器以外的军事支持。此外，美印还在商讨《通信互用性与安全备忘录协定》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美国表示愿意向印度分享涉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机密情报，并提议在美印情报部门间建立制度化合作。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的影响与局限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对两国以及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将产生一定影响。从两国层面看，美印防务合作在增强互信的同时，也促进了各自战略目标的实现。印度通过合作强化了军事力量，优化了利于其崛起的国际环境。美国则为其军工企业创造了贸易机会，并在打击海盗、反恐等方面缓解了压力和成本。从亚太和全球层面看，美印强化防务合作迎合了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从而恶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安全困境”。

美印强化防务合作也将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从海上安全来说，印度洋是中国战略资源进口与对外贸易的海上要道，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都要经过这里。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美印强化防务合作，无疑对中国构成了印度洋海上通道的潜在安全风险和挑战，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西部陆上边界的安全压力。

但是，美印防务合作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仍会试图在大国间寻找平衡。2015年10月，美印日三国海军首次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但同一时间印度也与中国举行“手拉手”陆军联合演习。美国为安抚因美印防务合作强化而渐生嫌隙的巴基斯坦，今年2月批准向其出售F-16战机，引起了印度的强烈“失望和不满”。美印《后勤保障协定》谈判长达12年才尘埃落定，就是因为印度政府担心受到协定条款束缚，从而失去战略主动权。可见，虽然美印宣称两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两国防务合作要走向军事结盟，则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长远的现实动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热点透析

在全球投资治理中实现中国价值

□ 文 洋

中国通过G20推动制定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全球投资治理领域贡献新的思想和引导力，提出中国方案，融入中国价值。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缺乏对投资规则的共识，相较于贸易领域，全球的投资治理远远落后。当前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成主要包括数千个双边投资协定和数百个带有投资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多种争端处理机制。这些投资协定条款相互交织、重叠，造成了投资领域里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即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下，各个协议的不同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国际投资协定缺乏总体设计，由此产生了诸多系统性问题，包括范围和内容之间的差异、重复和矛盾。此外，现有的国际投资规则只能为2/3的全球FDI存量提供保护，仅覆盖了1/5的双边投资关系。可以说，当前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是不完整和碎片化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短板。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全球投资治理体系需求强烈

然而，从国际投资发展、全球价值链深化及投资规则塑造来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构建一个统一、完善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需求。首先，国际投资规模呈扩张态势。2015年全球FDI流动达1.76万亿美元，同比上升38%。其中，跨国并购交易金额达7210亿美元，绿地投资金额达7660亿美元。伴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母国、跨国公司及东道国的相关利益也日益提升，迫切需要一个保护自身权益的制度安排。其次，全球价值链深化要求投资自由化和便利性。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要求打破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种种壁垒和障碍，迫切需要更加透明、公正和竞争性的国际投资环境。2015年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之中，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占比达到85%。第三，区域贸易协定的投资规则塑造日渐活跃。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投资议题的覆盖率为40%，而美国、日本和韩国所参与的FTA中投资议题覆盖率高达100%。这说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正在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争取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投资规则，进而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塑造和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抢占先机。

全球投资治理对中国至关重要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因此，无论从东道国维护本国利益，还是母国保护企业海外投资的视角，全球投资治理都对中国至关重要。我国需要保持对世界级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也需要“留权在手”保证国内政策的调整空间，还需要通过缔结高标准的投资协定以保护并促进海外投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构建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如何在全球投资治理中体现中国价值？首先，各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之前从未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全球治理中达成过共识。其次，为未来达成多边投资协定提供了可能性，在原则性的框架下可以进一步启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可行性研究，对未来达成多边投资协定奠定了基础。第三，作为世界首份投资政策的多边纲领性文件，为各国协调制定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了重要指导。

中国为《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成功制定和达成共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努力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美国关注投资的自由开放，欧盟关注对外商投资的环境保护规范，而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利用外资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料大国，这些方面的诉求都有，因此很好地扮演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在最终通过的九项指导原则中，既反对投资保护主义，鼓励投资自由化，同时又明确了东道国政府有权为公共利益而对投资进行监管，可以说兼顾了各个国家的不同关切。二是与国际组织展开良好合作。《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脱胎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关于国际投资政策长期大量的研究，中国与UNCTAD的有效合作促成了该原则在G20平台取得共识。UNCTAD在2012年就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鼓励各国将其作为参照制定投资政策，因此，我们看到《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最大的亮点是突出投资政策应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为目标。三是调集各方面有利资源力求达成目标。尽管中国致力于在全球投资治理等方面有所建树，但遭遇到不小困难，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有的国家还提出其他敏感议题淡化主题。因此，中国广泛邀请对华友好的力量参与进来，促使各方达成共识。

在全球投资治理中实现中国价值

在全球投资治理中实现中国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投资治理，体现中国的引导力，发挥中国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要体现中国的价值取向，既要实现中国的利益，又要有利于国际投资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推动全球投资治理中发挥中国的重要价值。我们需要从自身治理出发，以双边和区域合作为突破点，朝着多边投资治理的目标前进。一是自主推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不久前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展现了我国建立自由、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的决心，此项修订法案采纳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并规定了准入管理、安全审查、信息报告、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系列制度。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议程，只有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才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中国应进一步自主降低投资壁垒和简化投资准入程序；促进商业人员流动，放宽部分自然人流动限制；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逐步放宽外汇兑换和利润汇回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透明、公正与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二是加快与相关国家签署或变更双边投资协定（BIT）、自由贸易协定以适应新的形势。对尚未签署自贸协定或者BIT的国家，应尽快启动谈判程序；对于已经签订BIT的国家，加快协议条款变更和补充。加快推进与美国、欧盟的BIT谈判。美欧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者，未来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进展不可能不考虑美欧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应在谈判中与它们就国际投资规则取得共识，这有利于推进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形成。三是在恰当的时机倡议发起诸边投资协议谈判。在WTO框架内进行诸边投资谈判是实现投资规则多边化的有效路径，运用我国的影响力，组织利益相关的国家进行谈判。协定应允许其他WTO成员通过申请加入，为投资协定的扩围建立机制，以达成多边投资协定为目标。

在构建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融入中国的价值取向。首先，以投资规则推动形成以我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正处于不断深化和调整的时期，加之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价值链布局也呈现出更快的变化。当前，尚未形成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产业布局和分工体系，中国应认真研究投资规则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探索有利于形成以我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规则方案。第二，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治理中的利益。全球投资治理的成功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否达成共识。中国在2016年G20峰会上已经展现出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此次出席峰会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是历次峰会最多的一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在最重要的国际性论坛上的代表性。中国应延续这一思路，搭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有更加平等的话语权。第三，以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构建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国际投资规则，需要从以下四个层次进行考虑：充分考虑东道国总体发展战略；平衡政府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鼓励多方国际投资协作。比如，中国可以倡导在投资协定中体现“帮助条款”，鼓励母国企业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等关乎民生的社会公共产品。这样的政策立场既与我国当前“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的“义利观”相契合，同时也能体现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创新和完善。最后，倡导构建开放透明公平的全球投资治理格局。全球投资治理应以开放为导向，释放国际投资合作的潜力。各国应加强沟通和协调，不搞排他性和封闭性的治理机制，提倡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平衡投资母国、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各方利益，实现机制共建、规则共商、利益共享。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正在驱动国际投资规则的整合和完善，经济全球化只要不倒退，全球投资治理就会不断推进。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全球投资治理有强烈的需求，正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与自身利益相符的规则权利，而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且在较快的变化发展之中。中国通过G20推动制定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未来需要进一步在全球投资治理领域贡献新的思想和引导力，提出中国方案，融入中国价值。

世界经济